

中國佛教向日本的傳播

兼論中國佛教文化圈

魏承思

佛教傳入中國後，經歷了一個長時期的中國化過程，到了隋唐時期正式形成了中國佛教。與此同時，中國佛教繼續向東擴散。東北一路影響朝鮮和日本；東南一路影響越南，形成了以大乘佛教為特色的中國佛教文化圈。時下一般論者皆稱中國文化所及地區為「儒家文化圈」，其實這種說法頗可商榷。因為所謂儒家文化圈內各國所受中國文化影響最深刻、最廣泛的並不是儒學，而是佛教。因此，可以說中國文化圈的文化內涵應以佛教為主。對此，我們可以在中日文化關係史上找到充分例證。人們常說，古代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支流，日本文化之所以能形成發展為今日之規模全受惠於中國文化。而中國文化對日本影響最大者則為佛教。只要正確了對兩國文化關係的底蘊，了解佛教輸入日本後是如何發展，又是如何影響日本文化的，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一部中日文化關係史幾乎就是中國佛教向日本的傳播史。

從歷史上看，中日兩國大規模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徑是佛教徒之間的相互來往；主要形式是佛教的傳教和求法運動；主要內容

是包括思想、制度、文物和風俗在內的佛教文化形態。秦漢時期雖然已有漢人移民日本而帶去中國文化。但這只是一種無意識、無系統的文化輸入，並未對日本文化產生重大影響。六朝時中國文化經朝鮮半島東漸，儒學和佛教都傳到日本。應神天皇十五年（二八四），百濟（朝鮮古國）阿直歧來到日本，被聘為皇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他又推薦漢人後裔王二携《論法》一卷和《千字文》一卷至日。這是儒學傳入日本之始。繼體天皇十六年（五二二），南梁人司馬達等由朝鮮至日，在大和阪田原結草堂，安置佛像，日本人稱之為韓國神，這是佛教傳入日本之始。雖然佛教傳入日本晚於儒學約二五六年左右，但儒家文化最初並未在日本社會造成影響。相反，佛教傳入日本後，經蘇我氏迎佛派與物郭氏、中臣氏拒佛派衝突之結果，蘇我氏迎佛派獲勝，不久就風靡日本列島了。欽明天皇在向院建立了日本第一座佛寺。不久因社會上疫癘流行，人民死亡很多，大臣物郭尾與等陳奏天皇，歸罪於佛教，把佛像投入難波河中，並燒毀了廟宇。可是災難仍未平息，國人恐懼起來，又紛紛將佛像撈起，重修佛寺，佛教的聲勢重新恢復。敏達天皇時，蘇我稻目之子馬子繼其父極力維護佛教。崇峻

天皇繼位，馬子獨攬大權，拒佛派勢力被徹底消滅，佛教大盛。及至推古天皇即位（五九二），立聖德太子為攝政王，佛教更趨隆盛。推古二年天皇下詔興隆三寶。後來又把篤信三寶正式列入「十七條憲法」。聖德太子設立法學院，組織佛學研究，還親自作《勝鬘經》、《維摩經》、《法華經》注疏。在日本各地大興土木，修建佛寺。法隆寺、法興寺、四天王寺、廣隆寺等著名大寺都是在這一時期竣工的。到推古天皇末年，已建寺院四十六座，僧尼數達一千三百多人，並設僧正、僧都、法頭等檢校僧尼。佛教繪畫、雕塑、建築等藝術也已相當發達。在此之前，日本佛教文化均由朝鮮間接傳入，當時已不能適應日本佛教發展的需要，於是推古十五年（六零七）聖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等前往隋朝，直接到中國尋求佛法，拉開了中日兩國大規模文化交流的序幕。

聖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等出使隋朝的目的十分明確。據《隋書·東夷傳》記載：「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顯然是爲了尋求佛法。推古十六年（六零八）再次派遣隋使，這次大僧旻、清安、惠隱、廣齊等學問僧四人和留學生四人同往。他們八人都是在日本的漢人後裔或移民。這是日本歷史上向海外派遣留學生的嚆矢。隨後又有學問僧靈雲、惠雲等入隋求學佛法。他們在中國留學時間都很長，一般多從隋末到唐初，經二三十年後方才歸國。從此日本派遣僧俗學人來中國留學者絡繹不絕。據日本史書記載，入唐求法僧知名者共有一百一十二人。其中有些是學問僧。有些則是已在國內學有專長，帶着疑難問題入唐請教深造的請益僧。五代時來華知名日本僧人計有七人，北宋計有二十人，南宋一零九人，元代二二二人，明代一一零餘人，（據木空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統計）當然因史書失載而湮沒無聞者更是不計其數。這些日本來華求法僧在歷代日本來華的文化使者中佔了絕大多數。他們從中國吸取佛教文化，順便也把儒學、道教和一切中國傳統文化之精華帶回日本。在大批日本僧來

華的同時，又有許多中國高僧東渡，他們不獨傳播佛教，也弘揚了中國各方面的文化成就。其中尤以道睿、鑒真、道隆、祖元、一山一寧、隱元影響最大。他們都對日本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二）

隨着來隋唐留學求法的僧侶次第返日，以及中國高僧赴日弘法，奈良時代在日本逐漸形成了三論、法相、華嚴、律、成實、俱舍等六大宗派。日本歷史上稱爲「南都六宗」它們無不淵源於中國佛教。首先，三論宗是由吉藏的弟子高麗僧慧灌最早傳到日本。六二五年慧灌在飛鳥元興寺弘講三論，開始建立三論宗。這是日本有佛教宗派的開端。隨後慧灌的大弟子福亮又入唐，謁吉藏大師，重研三論。返日後在元興寺宏化，盛弘空宗。福亮的兒子出家，法名智藏，後來也入唐游學，歸住法隆寺，弘傳三論。智藏門下英才濟濟，其中道慈於七零二年入唐，在唐十八年，廣學多聞，尤其精通三論學。歸國後弘揚三論，兼傳真言律學。日本史家稱：「三論一宗從唐土傳入有三代傳：一慧灌僧正傳，二智藏僧正傳，三道慈律師傳」（《三國佛教傳通緣起》）。慧灌在日本同時傳習的還有成實宗。但它後來沒有獨立弘傳，只是附在三論宗內。其次法相宗（唯識宗）是由日本僧道昭最早傳入日本。俱舍宗是法相宗的附宗，也是同時傳入日本的。道昭於六五三年隨遣唐使赴唐，受教於玄奘大師。研習唯識學，兼及《俱舍》。在唐七年，六六一年賈經論歸國住元興寺開創日本法相宗。玄昉於七一六年入唐，從智周學習法相宗義。七三五年賈同所得佛像和漢文經論五千餘卷歸國。時在唐開元藏編定不久。一般認爲可能就是開元大藏經的全部。玄昉歸國後，在奈良興福寺弘傳法相，稱爲北寺傳。再次，在華嚴宗方面，最早來日本弘法的是唐東都大福先寺僧璿。他應日本學問僧榮睿、普照之請於七三六年携帶

《華嚴》章疏渡日，弘傳此宗，兼傳戒律。後來賢首的弟子新羅僧審祥到日本，在金鐘寺道場開講《華嚴經》，為日本華嚴宗初祖。

日本律宗則是由唐代高僧鑒真大師創立的。鑒真（六八八—七六三）俗姓淳于，揚州江陽人。十四歲出家，是南山律宗的嫡派傳人。當時日本佛教的授戒傳律沒有統一的正規的制度，諸寺院各行其事，僧人剃度也大都採用「自誓」的方式。故日本僧榮睿、普照等於七三三年相偕入唐，求學戒律。他們聽說鑒真為當代律學大師，遂於七四二年至揚州懇請他東渡弘化，當蒙允准。其時他已經五十五歲，他的大弟子祥彥曾以「彼國太遠，生命難存，滄海淼漫，百無一至」苦諫阻其行。但鑒真毅然決然地說：「是為法事也，何惜生命，諸人不去，我即去耳！」次年鑒真和他的徒眾齊同經論法物啟舟東行。前後五次皆因人為阻力和風浪遇險而失敗。大弟子祥彥和日本僧睿皆死在途中，他自己也雙目失明。但一次次的失敗，他又一次次東渡。在橫逆頻加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初衷，夙志不變。經過十二年不屈不撓的奮鬥，終於第六次即七五三年抵達日本。受到朝野僧俗的盛大歡迎。次年在奈良東大寺築戒壇，天皇、皇后、皇太后、公卿等四百四十餘人皆從受菩薩戒。日僧靈裕、賢戒、志忠等八十餘人皆拾舊戒，重新請鑒真授有三師七證的具足戒。是為日本登壇受戒的開始。七五九年又於奈良建唐招提寺，並設戒壇，前後受度者四萬餘人。依法授戒還只是律儀上的示範，鑒真認為更主要的是傳佈律學。他和同行弟子以東大寺、唐招提寺為基地，向日本各地前來的僧人傳授律學。從此以來，日本律儀漸漸嚴整，師資相傳，遍於環宇。日本律宗由此肇基，鑒真以後再沒有回到祖國，而於七六三年逝世於奈良唐招提寺，葬身在異國土地。他不但為中國佛教在日本的傳播奠定了基礎。而且在建築、繪畫、雕塑、醫藥等各方面都把唐代燦爛的文化帶到日本。他對日本文化進步立下的豐功偉績永遠為後人所緬懷。

由於唐地佛教的盛行東傳，日本養老四年（七二零）十二月，曾敕令佛教轉經唱禮須依漢沙門道榮和日本入唐返國的學問僧勝曉等的音調轉唱，並停止餘音，免污法門（《讀日本紀》卷三）。又當時日僧多學漢語。唐道叡、鑒真等渡日，都以漢語從事講授。此外如佛教儀禮，經像、文物、建築式樣、工藝等也大量由唐輸入日本。

公元七九四年，日本國都由奈良北遷至仿唐京長安而建築的平安新城，開始了平安時代。日本求法僧仍然絡繹不絕地入唐求法，於是更有天台、真言（密宗）的開創。平安時代來華的日本求法僧以「入唐八家」最為著名。他們是學習天台宗義的最澄、圓仁、和圓珍，學習真言宗（密宗）的空海，常曉、圓行、惠運和宗睿。最澄，滋賀人，幼年出家，因接觸鑒真從中國帶來的天台宗經釋而立志弘揚天台宗義。曾在比叡山舉行法華經義宣講，並親臨高雄山寺法華會擔任證義，因其對佛法的高深造詣而引起轟動。八〇四年經天皇允准入唐為還學僧。所謂「還學僧」是指隨遣唐使入唐並隨其同歸的求法僧。最澄到天台山從道邃、行滿、順曉等學習天台教儀以及密教。次年携同所得經論疏記二百三十部四六〇卷歸國。在此睿山開創日本天台宗，兼傳密教和大乘戒法。著有《唐決集》、《守護國界章》等書二八〇餘部。死後被尊為傳教大師。圓仁及其弟子惟正、惟曉，侍役雄萬等一行四人在八三八年入唐，在中國揚州、五台山、長安等地遊歷九年零五個月，學習密教。歸國時携回佛典五八四部八〇二卷以及密宗曼陀羅，高僧像等五十九種。並將求法巡禮的見聞寫成《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四卷，真實地記錄了唐代佛教和社會狀況以及當時的中日佛教關係。圓珍於八五三年隨唐人商船入唐，遊歷了福州、溫州、台州、越州等地。又在長安龍興寺和大興善寺學密教，受灌頂位。訪天台國清寺後携所得經典四四一部及各種佛像法器於八五八年歸國。空海是中日文化關係史上最傑出的代表人物，史稱「弘法

大師」。空海、贊岐國多度郡屏風浦人，自幼兼習儒佛經典，曾著《三教指歸》。二二歲出家，修習三論宗義。八〇四年與最澄同行，隨遣唐使入唐。於當年九月到福州，旋入長安住西明寺。次年從青龍寺惠果阿闍梨修習金剛界，胎藏界密法，受灌頂位和「遍照金剛」稱號。惠果又令畫工、經主、鑄工圖繪所有秘密曼陀羅，並書寫《金剛頂》等最上乘密經，新造各種法器相贈。空海於八〇六年八月，携同所得經典二一六部和諸圖具等返國，於高野山創建根本道場。樹立日本真言一宗規模。著有《秘密曼陀羅教付法傳》、《辨顯密二教論》等書一五〇餘部，常曉與圓行於八三八年同乘遣唐使船抵揚州。常曉入栖霞寺，從文璨阿闍梨受金剛灌頂和太元密法。次年携所得經籍乘使船歸國，弘傳密教。圓行到長安受教於青龍寺義真，仍於次年和常曉同船回國。慧運於八三八年乘唐人商船抵溫州，旋赴長安，禮義真，入灌頂壇受諸密印。八四七年歸國，携回密教經軌一七〇卷，興建安祥寺，形成日本真言宗安祥寺一派。宗睿於八六二年乘商船入唐，初謁玄慶於汴州，受金剛部法，後入長安青龍寺學胎藏法。通曉密宗、法相、天台宗義，留學五年後携所得經書一三四部及諸文物歸國。這「入唐八家」都從中國求得大量經書文物，各編寫一部《請來目錄》，對日本佛教發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天台、真言二宗是這一時期日本最佔優勢的兩個宗派，即日本歷史上所謂「平安二宗」。

五代北宋間，日僧來華參學並朝禮名山佛跡的有甯然，寂照，成尋等人，其中最先入宋而且最有名的是甯然。他和徒衆六人於九八三年乘宋人陳仁爽的商船到台州。次年入京見宋太宗，進獻方物，賜法濟大師稱號。又巡禮五台及洛陽龍門等勝跡，並蒙敕贈新印的摺本藏經五千餘卷，與他同來的沙門成纂，曾在洛陽太平興國寺學習悉曇梵文。甯然的弟子嘉因並受五部秘密灌頂。九八五年他們一行仍由台州乘宋人鄭仁德的商船返日。甯然

曾將在宋見聞經歷寫成《入宋日記》四卷（今佚）。日本僧在兩宋時曾多次求得宋版大藏經如蜀藏、福州藏等回國，並時常在奈良、京都、鎌倉各大寺舉行一切經供養法會，典儀很盛。對日本佛教文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日本鎌倉幕府時代正當中國南宋時期。中國本土盛行禪宗和淨土宗。日本受此影響，禪宗、淨土宗和日蓮宗也勃然興起。遠在奈良時代，禪宗已由道昭、道睿、最澄等傳入日本。但禪宗正式弘傳，則開始於入宋參學歸國而首創臨濟宗的榮西。榮西、岡山吉備津人，十四歲出家，曾從叡山有辨學天台宗，又從基好學密教。再回到諡山閉門精讀藏經。後在築前的博多遇宋朝通事李德昭，得聞宋地禪宗盛行，便急切地欲往南宋求法。一一六八年，他搭商船入宋，到天台山巡禮。同年九月，帶天台宗章疏三十餘部回國。一一八七年再次入宋，在天台拜謁虛庵懷敞，受傳臨濟心印。後又隨侍虛庵遷往天童山，蒙傳與法衣印信。歸國後大興臨濟禪法，參禪之徒從四方雲集而來。一二〇二年在建仁寺開山，並著《興禪護國論》等七部九卷，成立日本臨濟宗。榮西死後，禪宗逐漸得勢，往來中日弘佈其教者很多。當時中國臨濟宗的看活禪盛行，而曹洞宗的默照禪僅剩一線命脈而已。因此，在日本傳播的也主要是臨濟禪法。後來榮西再傳弟子道元於一二二三年入宋，歷訪天童、經山、天台等地，參謁無際了派，浙翁如琰等，終於得到天童長翁如淨的啟發而豁然開悟，並蒙印可，受傳秘蘊和衣具頂相，於一二二七年歸國。在永平寺開堂講法，並著有《正法眼藏》、《大清規》、《普勸坐禪儀》等九部一一八卷，開創了日本的曹洞一宗。其時因船舶交通較前更為便利。日本僧入宋參學的非常頻繁，他們幾乎都受到禪宗的影響。同時，中國禪僧也紛紛東渡日本弘傳禪學。特別是宋末，因反抗元朝統治者到日本避難的禪僧更是紛至沓來。南宋到日本傳法的禪僧影響最大的是蘭溪道隆。道隆、西蜀人、陽山無明慧悟的法嗣。一二四六

年應日本入宋僧明觀智鏡等勸請，携弟子乘船渡日游化，依宋地清規宣揚禪風，受到執政北條時賴以下僧俗的歸依，創立建長寺。有《語錄》三卷傳世。於一二七八年在日本逝世，諡號「大覺禪師」。道隆有門徒二十四人，其中再渡海入宋參學的有十一人之多。道隆之後，東渡的中國禪僧還有兀庵普寧，大休正念，西澗士曇和無學祖元。祖元是無准師範門下的高僧，一二七八年應鎌倉幕府的邀請到日本，繼道隆主持建長寺。在那裏大揚禪風，受到日本朝野僧俗一致歡迎，並為圓覺寺開山初祖。連嵯峨天皇的皇子也成為他的大弟子。道元於一二八六年逝世被諡為「佛光國師」。由於中日禪僧來往密切，因此這一時期禪風大振，幾乎壓倒其他所有宗派。歷史上傳到日本的禪宗有二十四派之稱，當時傳入的禪宗流派就佔了十之七八。鎌倉時代淨土宗也在日本廣泛傳播。先是天台宗高僧良忍以《華嚴》、《法華》經融通無礙的教義融通念佛，開創了融通念佛宗。隨後又有法然，以淨土宗「三經一論」為根本依據，以善異為宗祖，確立純粹念佛，他力往生的教義，大唱稱名念佛法門，在日本正式創立淨土宗。受到貴族、武士和下層民衆的皈依。法然門下又有親鸞提出念佛以「信心」為主，使淨土法門更簡單易行，並創帶妻弘教，開淨土真宗一派。他這一宗在日本發展最盛，後分為大谷和本願寺等派。同時，又有天台宗僧日蓮奉持漢譯《法華經》，以高唱「南無妙法蓮華經」題目為主，而新創了一個日蓮宗。這些宗派使佛教在日本更形大衆化，構成鎌倉佛教的一大特色。雖然日本淨土宗的創始者法然、親鸞等均未到過中國，但都是依據中國傳入的佛教思想和經典立宗，故也是基於中國佛教的傳衍而形成的宗派。元代初年，日本因元兵往侵而曾經與中國中斷交往。一二九九年，元成宗派江浙釋教總統普陀山高僧一山一寧等往日本通好。初被日本疑為間諜，遭受逮捕，不久釋放，被迎住建長、圓覺、淨智、南禪等大禪寺。在鎌倉，京都盛揚禪風，前後近二十年。門下造就

英才甚衆，其中如龍山德見、雪村友梅、無著良緣、嵩山居中、東林友丘等都曾入元朝禮祖庭。

江戶時代，日本臨濟宗、曹洞宗已出現頹勢。一六五四年，中國黃蘗山住持，臨濟宗高僧隱元隆琦應日本長崎崇福寺僧逸然之請，率弟子數十人東渡日本。受到德川幕府皈依在宇治開創黃蘗山萬福寺，龍吟虎嘯，大振宗風。當時日本臨濟、曹洞宗人紛紛投入他的門下，在日本名聲大噪。不但創立了日本黃蘗宗，也刺激了臨濟、曹洞宗，終於使日本禪宗三派長盛不衰。隱元到日本後，明亡，滿人入主中原，他為不忘故國，寺院一切規制都依中國舊例。誦經用漢音，交談用漢語。據說，當時日本「唐音所聞，幾遍於全國」。甚至飲食起居也是中國生活方式。自隱元以後，黃蘗住持十三世皆為中國僧，曾有日本內地「小中國」之說。日本黃蘗宗至今仍有佛寺五〇一座，信徒八萬人，大多數寺院仍保存中國近代禪林風格。

(三)

隋唐以後，中國儒家文化也逐漸影響日本。但它的傳播主要是借助於佛教徒的傳教求法運動，本身則很少有佛教那樣的傳播規模。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儒學是依附於佛教才得以傳到日本的。日本最初派出遣隋使只是爲了尋求佛法，但因此而了解中國文化的各項成就，而產生廣泛輸入中國文化的願望。如《馭戒慨言》說：「及至聖德太子聽政時，所遣多爲求佛法之使節，而自昔韓國之人，來者甚多，得親侍太子。太子既聞其經常讚揚大唐爲可欽羨之國，並閱讀漢文精澁典籍，便思設法與之通好，萬事悉欲仿效之心與日俱增。」雖然，自第二次遣隋使起，就經常有學習中國儒學，法律、陰陽、醫學的留學生來華。但他們與學問僧相比較，不但人數少，而且很少有單獨來華的。故他們的影響遠不及佛教徒。況且，日本求法僧中間更有不少兼通內外之學的知

識分子，許多儒家學說及其經典反而是經他們介紹到日本去的。特別是後來宋代理學在日本的傳播起初幾乎全部依賴於佛教禪僧。一一九九年春，日本律學沙門俊薛乘舶入宋，歷訪天台、雪竇、徑山等兩浙名刹，與律、禪、密宗名僧廣泛交游。最後於一二一一年携同所得佛儒經典二千餘卷回國，住泉涌寺，重興日本律學。他携回的經籍中包括儒家經典二五六卷，雜書四六三卷。俊薛帶回大量儒書，是與他對宋代理學的興趣分不開的。他在宋都臨安與當時的儒家大師過從甚密。後人稱俊薛其人：「孔父老莊之教，相如楊雄之文，診脈漏刻之方，鎔鈇混淆，洞達深致。不啻通內外，兼巧操觚藝，筆神墨妙，人多珍玩。」足見他的學識淵博。另外，東福寺的開山祖圓爾辨圓也於一二四一年自宋帶回數千卷典籍，藏在普門院書庫，並親自撰《三教典籍目錄》。據日本《元亨釋書·圓爾傳》記載，「蓋爾師歸時，將來經籍數千卷，見今普門院書庫，內外之書充棟焉。」這些典籍對於日本五山儒學，詩文學的興盛起過很大作用。（注：五山指京都五山：第一山為天龍，建長寺；第二山為相國，圓覺寺；第三山為建仁，壽福寺；第四山為東都，淨智寺；第五山為萬壽，淨妙寺）不過，正式在日本傳播宋學的則是一山一寧。一山學識淵博，他在日本二十年，不但大振禪風，並積極傳播宋學。他的高足虎關師煉曾從其問程朱易說及太玄之旨，於宋學則排斥朱子而推重周濂溪。師煉成爲日本的宋學先驅。當時的禪宗中心——五山也逐漸兼有儒學中心的作用。不但大量印行禪書，同時也積極出版儒書。五山禪僧裏也湧現出不少兼精宋學的學者。如義常周信涉獵經史百家。著《六華工集》持論揉合儒釋，以五常同以佛教五戒，以《孟子》、《中庸》、《孝經》爲人所必讀。中岩月圓，十二歲熟讀《孝經》、《論語》。入元遊學八年，回國後主持禪寺。著有《東海一謳集》、《中正子》等，力倡佛儒相爲表裏。在五山學僧中爲傑出人才。當時儒家之講述，全出於佛教僧人。當時日本的參禪者

對於禪所帶來的一切都樂於接受。故宋學便在日本知識層裏廣泛傳播開來。後來這一本來附着於禪宗的文化形態，逐漸離開本體而成爲獨立的存在。江戶時代初期，朱子理學已經與禪學各自劃出勢力範圍，但當時儒者仍與僧人一樣是剃光頭的。如最早用朱子訓注來祖述宋學的藤原煇窩本來是一位禪僧。因愛好儒學，而拋棄了僧衣，但仍保持了圓頂。由此也可見日本儒學與佛教的密切關係。明末清初，余姚朱舜水到日本創水戶學派，使江戶時代的儒學大盛，但影響仍在上層社會和知識分子中間。明治維新以後，歐美的西方文化風靡日本，儒學幾成絕響。但佛教却仍然影響着日本現代文化。這也從另一角度證明了佛教對日本文化影響遠勝於儒學。

(四)

中國佛教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既深刻又廣泛；不但直接涉及建築、雕塑、繪畫、書法、文學、文字、印刷和風俗等方面，也間接影響到政治。從推古朝的制度設施，直到「大化改新」，無一不是佛教影響的結果。推古朝的官制、禮制、法律等皆由入唐求法僧移植隋唐制度而來。「大化改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鎌足二人曾受教於南淵清安，而入唐學問僧僧旻則任國博士，在大化改新中成爲中堅分子。在這些物質效果之外，佛教思想對日本人內心的感化也是極大的。正如日本學者村上青精所言：「我國人在過去僅提出如正直、清靜等幾條道德規範，還沒有形成超出祭祖的幽玄的思想，然而在佛教傳入以後，也得以養成頗爲形而上的觀念」（見《日本佛教史綱·總論》）。特別是宋代禪宗傳入日本後激發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因爲禪宗以寡欲質素爲宗旨，故能克服營私縱欲的念頭。禪宗既不重視形式，又不尚理論，只在真參實究，求得心地解脫。三衣一鉢之外，不思居處，不求衣食。奉守百丈清規，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這種積極性，刻苦磨

煉身心的力行，正與武家教訓相吻合。而禪宗視死如歸，生死一如，「身輕法重，死身弘法」一類的思想，對於武士道的影響也很大。武士道的德目，以忠孝、武勇、慈悲，禮讓、勤儉、質素為主。即以廉潔而論，這跟質素生活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廉潔，就得質素，因能質素，就能保持廉潔操守。武人一愛錢，就得不到民衆擁戴。因之，我們縱不能說武士道的精神全來自禪宗，但至少武士道的德目，正與禪宗教義相契合。無學祖元東渡後，經常對武士說法，他說：「若能空一念，一切皆無惱；一切皆無怖，猶如著重甲，入諸魔賊中；魔賊雖衆多，不被魔賊害，掉臂魔賊中，魔賊皆降伏。」祖元這種壯烈鼓勵武士的精神，較諸寡欲質素的生活教育，更為積極，更為生動，更令武士醉心於禪宗精神，當時幕府中心人物北條時賴因皈依佛教禪宗，終於依道隆出家，讓政權於北條長時。並獲另一宋僧普寧印可。臨終時身穿袈裟，端坐禪床，述偈而逝。普寧稱其：「末後一機，超佛越祖」。這更是对鎌倉武士精神上產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

在建築方面，日本佛教寺院完全仿照中國規模。如天平時遷建大安寺時，就是由道慈仿照長安西明寺設計建造的。據《日本續記》記載：「遷建大安寺於平城，賴法師勾當其事，法師尤妙工巧，構作形制皆稟其規模，所有工匠莫不嘆服焉。」大安寺是日本古代最宏偉的寺院。又如源賴朝重建奈良東大寺大佛殿，督工是兩次入宋的重源和尚。鎌倉圓覺寺的舍利殿是照搬宋代禪刹式樣，由榮西傳入。佛寺建築也影響到一般宮殿民宅的建築風格。藤原時代的貴族住宅佈局，建築物與庭院之間的調和，發揮了優美典雅的日本風趣。但其左右對稱的配置顯然是受到中國傳統的影響。

在雕塑方面，日本奈良時代東大寺盧舍那佛的鑄造，則是模仿唐代白司馬坂大佛像。藤之朝鑄造東大寺大佛時則有宋朝鑄佛師陳和卿參加。天平時代日本佛教造像藝術更是達到頂峯。這顯

然是得力於鑿真東渡。《東征傳》記載：鑿真於「講授之閑，造立寺舍，供養十方衆僧；造佛菩薩像，其數無量。其中最傑出的是唐招提寺金堂的盧舍那佛坐像，這是現在日本所保存的乾漆雕像中最大、最宏偉的一尊。其面相於穩靜之中露出嚴肅的神情，體態宏偉，衣紋柔和自然，都是同時代其他佛像所不能比擬的。鑿真帶去的雕白旃檀千手像，藥師彌陀彌勒菩薩瑞像，法隆寺九面觀音像，也對日本造像藝術的風格和技術產生重要影響。

在繪畫方面，隋唐傳入的大量佛像與宗教畫，所謂卷軸畫，逐漸形成藤原時代流麗典雅的畫風。明末僧人帶來大批書畫，黃蘗山遂成爲大陸書畫美術館。日本藝術得此畫啟發者不少。雪舟等楊於明成化中西遊，學潑墨山水，歸國自成一派。自室町時代至江戶時代，所有水墨畫，狩野派，文人畫派以至園山——四條派等。雖流派不同，却都與中國畫的影響有關。如平安時代發展最盛的是卷軸畫藝術，用圖畫解釋佛經的因果故事。這些卷軸，上下平分爲兩組，腰錢以上從右到左，上邊爲繪畫，下半部分爲連環講解經題的故事。這從中國石窟繪畫演變而來，成爲獨立發展的卷軸畫。又如十三世紀，特別是受中國宋元兩代傳來的影響，日本繪畫又有了嶄新的面貌。那種逸筆草草，不拘一格，以古淡爲貴的水墨畫與禪宗的關係是很深的。其時的如拙、周文、宗湛、雪舟、宗譽、雪村、秋月、宗淵、周德等即是禪師又是畫師，尤以雪舟的藝術成就最爲突出。中村不折在《中國繪畫史》中說：「中國繪畫是日本繪畫的母體，不懂中國繪畫而欲研究日本繪畫是不合理的要求。」這是較爲切實的說法。

在書法方面，書法線條筆劃的葛藤之美，是東方藝術的瑰寶，被人譽爲「無聲的音樂，立體的畫，有情的詩。」日本通過百濟始輸入漢字，又由於遣隋使的往返而直接引進了中國書法。使得追摹唐風的聖德太子於政事之餘，爲大陸書法的翰墨濃香沐薰陶醉了。其格調優美而和諧的《法華義疏》，構成了日本書法史上

第一塊里程碑。它具有強烈的六朝韵味，在節奏優美的筆畫中顯出圓潤的風格。日本書法史上艷稱的三筆，即嵯峨天皇、空海和桔逸勢。空海書法，則試圖把王羲之優雅秀逸的風格和顏真卿渾厚樸茂的精神統一起來。空海自謂在唐「頗習骨法，今於墨法雖未得之，而稍覺規矩。」觀其所書《灌頂名冊》已把王羲之和顏真卿的書法風格運成一體。感覺豐富的筆觸和厚重的流動感，正是空海孜孜以求綜合風格。而傳世的《風信帖》，「顯示出充滿自信的意趣；美妙的書式，滲透了對新的筆法的自負。」隨着宋元間中日禪僧往來的頻繁，書家們也突破唐人矩矱，提倡個性解放，「自出新意」。於是蘇、黃、米、蔡四大家書法，相繼輸入，受到日本禪林間的歡迎。能書的名僧輩出，如榮西、道元及其弟子多擅長宋人書法，筆力挺勁，簡煉有力，在日本書法史上被稱爲「禪宗樣」。江戶時代，隨同黃蘗宗的興起，在日本書法史上又出現了以隱元、木庵、即非「黃蘗三筆」爲代表的流派。他們以雄渾豪放見長，自成一家，不同凡響。

在文學方面，日本最古的漢詩文集，有《懷風藻》、《凌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都成書於唐中葉，深受六朝到唐初駢儷文體的影響。到平安朝初期，漸學唐代近體詩。空海作《文鏡秘府論》六卷，抄撮唐人詩格、詩式之精華影響於日本和漢文學作風者至巨。從此聲律詞章之學，日益講究，蔚成風氣。鎌倉、室町時代，文學藝術從縉紳先生轉到五山和尚手裏。這時期漢詩文代表作家，以前是虎關、雪村、中嚴，以後是夢窗、義堂、絕海，都是僧人。日本的語言文字也與佛教徒有密切關係，隋唐以後，日本大量輸入中國詞匯，模仿中國文法，用漢字跟假名類寫，形成一種很特殊的文字。片假名採自漢字偏旁，平假名採自漢字草書，其中平假名就是由空海創制的。空海、圓仁、圓珍在中國研究悉曇（梵字），並把研究悉曇學之風帶回日本，推動了日本音韻學的發達。日本五十音的排列似亦在悉曇影響下完成

的。

由於梵漢經典的輸入、傳播，而連帶引起日本印刷術的發明。據說神護景雲四年（公元七三〇年）刊印的稱德天皇敕印《無垢淨光陀羅尼》，是日本現存最古的印刷品。一般論者都認爲這種印刷術也是從唐朝輸入的。從倣然回國不久，日本的刻版事業日漸昌盛，特別在京都貴族之間經常爲了供養而印刷天台經典，稱爲「折供奉」。自一條天皇寬弘六年（一〇〇九年）開始印刷《法華經》一千部起，多次舉辦「折供奉」。正企院聖法藏所藏的《成唯識論》，以及有平安時代墨書和朱書的識語而能保存至今的刊本，亦復不少。已是一度中絕的日本刻版事業，重又興盛起來的契機，實與倣然帶回《大藏經》一事有直接關係。正平六年，足利直義曾令僧人解一管理《一切經》的印版事宜。正平八年（一三五三），足利基依照宿願刊印《大般若經》一部六百卷。當時五山的出版事業尤盛，印的多半是禪僧的語錄和詩文集，儒、道、諸子百家的書、歷史書以及其他雜書，似乎都是從元朝輸入。

日本的民間風俗也頗受中國佛教文化影響，如四月初八浴佛會，七月十五盂蘭盆會均在日本相沿不絕。日本民間葬禮多用火葬，除立坟外，另取骨灰置家中供膜拜。此法即留唐僧人道昭首創，相傳至今仍然流行不失。尤其是日本人的飲茶之風，自榮西從宋朝輸入茶種，著《吃茶養生記》以來。最初以禪林爲中心，以後逐漸推廣起來。到了日本的南北朝時代，唐式茶會便流行起來，形成日本獨具一格的茶道。由於唐式茶會的流行，連帶使得食物烹調法、住宅設計、室內裝飾，以至庭園的建築藝術等都受到很大影響。據《吃茶往來》（玄慧法師）和《禪林小歌》（聖岡）所載，唐代茶會全是中國式的，點心湯羹多至二十餘種，一切都和中國的會餐法無異。綜上所述，顯見中國佛教對日本文化的熏陶之深，就其深度和廣度而言都是儒家文化所不能企及的。

（完）